



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

主编 陈 来

胡 适 选集

HUSHIXUANJI

欧阳哲生 / 编



中国哲学的阐释
西方哲学的透视
哲学体系的创建
20世纪中国哲学大师
20世纪中国哲学经典之作
20世纪中国哲学成就标志

吉林人民出版社

胡适选集

欧阳哲生 /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胡适选集/陈来主编,胡适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 7-206-04684-3

I.北… II.①陈… ②胡… III.胡适(1891~1962)—哲学思想

IV.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3360 号

胡适选集

著 者:胡 适

编 者:欧阳哲生

策划编辑:徐家康

责任编辑:崔 凯

封面设计:沈 赫

责任校对:校 科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95846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970mm 1/16

印 张:43.75 字 数:7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684-3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册

定 价: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北京大学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自新文化运动初期以后，更成为全国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的中心，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1898 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以后，本设有经学、诸子学、理学等传统哲学课程，但未立“哲学”之名。1912 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学科设置改革，乃明确建立文科“哲学门”，至 1919 年，哲学门改称“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近代大学所建立的第一个哲学系，自北大哲学门 1914 年正式招生，至 2004 年，北大哲学系的建系历史已经走过整整 90 年。

20 世纪中国的哲学教育与哲学研究的发展，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北大哲学门建立以来，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唐钺、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冯定、陈康、贺麟、洪谦、朱谦之、张岱年等著名学者都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可以说，20 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绝大多数都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有关，而他们当之无愧地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界所拥有的自己的大师。这些大师中的任何一位，若在全国其他大学的哲学系，都可以成为这一大学足以为傲的光环；而北京大学哲学系曾拥有如此众多的大师，也就使北大哲学系拥有了其他大学难以相比的得天独厚的资源。正是这些大师们，使得 20 世纪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对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北大哲学系 90 年的发展史即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史的缩影。

北大哲学系的这种地位也是历史地形成的。民国初年从北京大学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使得它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抗战期间，北大与清华、南开合为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中心；1952 年院系调整，把当时全国大学的哲学系都集中在北京大学，成为全国大学唯一的哲学系。1956 年以后，北大哲学系不断调出教师，或接受进修，积

极参与了各地大学哲学系或哲学专业的重建或新建，以及哲学研究所的成立，而且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成了全国各大学哲学系教师队伍和哲学专业人员的重要培养来源。这一切使得这些哲学教育与学术的单位，在哲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上，不同程度地以北大哲学系为楷模，受到北大哲学系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在上述历史变化的过程中，北大哲学系由于不断吸收清华大学哲学系和来自全国其他哲学系的营养，丰富和壮大了自己的发展，培养起了哲学学科兼容并包、多元发展的风气和心态。在研究方法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北大哲学系在胡适、汤用彤的影响下，形成了重视哲学史研究的风气和传统，而清华大学哲学系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发展中，以冯友兰、金岳霖为代表，渐渐形成了重视逻辑分析方法的哲学传统。在哲学体系上，北大的熊十力、梁漱溟、贺麟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心学”关系密切，而清华的冯友兰、金岳霖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理学”接近。经过西南联大的合作和院系调整的合并，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北大哲学系，融合了不同的学术追求，兼重思想资料和哲学分析，在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上，基础更加宽厚，力量更加充实，研究更为多样。当然，今天北大哲学系的传统，不仅仅是融合了来自其他大学的传统和优长，其自身也历经了种种的发展。如1949年以后，与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者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洗礼，在理论素养和研究品质上有了进一步提高，从而，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和理解，结合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获得了以前不可能有的成绩，在各个学科方向上也丰富了自身研究的传统。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密切联系，除了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形成的地位、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变迁、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不断融合等历史的和外在的因素之外，也揭示出现代哲学的发展与大学建制的牢固结缘。从世界历史来看，近代社会与制度变迁给哲学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哲学的主要舞台转移到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转到以大学为主的现代教育、科研体制中来，这使得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性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大为发展。事实上，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家无不以大学为其讲学著述的依托。所以，尽管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中仍有不满于学院体制或倾向于游离学院体制之外的人，但绝大多数哲学家

和研究哲学的学者都不可能与大学绝缘，因为大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提供哲学基础教育和哲学理论研究环境的基本体制。哲学与大学的这种密切关联，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其结果是，哲学作为大学分科之一在近代教育体制中获得一席稳固的地位，而哲学家也成为专业化的哲学教授。上面提到的 20 世纪中国哲学家，他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和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建立，也都在大学之中。即使是最倾向于学院外体制的梁漱溟和熊十力，他们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新唯识论》也都是任教北大哲学系时期完成的。哲学与大学的这种关系，从一个方面标志了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时代的分野，同时也不能不对哲学发展的本身造成影响。

本系列收入了十位 20 世纪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中国哲学家的研究著作，即胡适、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朱谦之、贺麟、洪谦、张岱年。这些哲学家的著述，如果参照 50 多年前贺麟所总结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格局，在内容主体上可分为三类，即中国哲学的阐述，西方哲学的介绍和哲学体系的创立。这十位哲学家大都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有些虽未建立明确的哲学系统，但其对哲学史的研究亦体现了他们的哲学态度和哲学立场。无论如何，这些哲学家的著述，或具有对中国哲学的精湛研究，或具有对外国哲学的透彻了解，或建立起自己特色鲜明的哲学体系，都在哲学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堪称为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这些现代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无论是哲学史的研究，还是哲学体系的建立，在 20 世纪世界哲学的相应领域中都达到了一流的水平。回顾这些 20 世纪哲学经典之成就的取得，有两点十分突出：第一，现代中国哲学的哲学研究，无不以西方哲学及其发展历史为参照的背景。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学者自不必说，即使最具传统特色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他们的哲学问题意识也都受到西方哲学观念的深刻影响。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属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西方哲学已经成为现代哲学学科的基础，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而深入了解西方哲学和世界其他哲学，将促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哲学传统。第二，现代中国的哲学体系的创制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建立积极的关连。正如陈寅恪所说，“窃

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果亦当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熊十力的新易学、梁漱溟的新儒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新实在论、张岱年的新唯物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自觉地与中国古典哲学相相应，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相结合，20世纪在构建哲学体系上卓有成就的中国哲学家皆是如此。

本系列的编辑，缘起于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策划，而委托我来加以组织。今年2004年是北大哲学门成立90周年，精选北大哲学系的著名哲学家的重要作品并编辑为系列，不仅可以作为对北大哲学门90周年的纪念，也是对20世纪中国哲学成就的总结展示，对21世纪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亦可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我接受这一工作后，根据出版社先编辑中西哲学部分的意见，即选定十位已故的曾任教北大哲学系的哲学家，邀请了专门研究这些哲学家的专家参与合作。他们是：胡军教授、李存山教授、张学智教授、景海峰教授、欧阳哲生教授、孙尚扬教授、黄夏年教授、韩林合教授等。他们对所编的哲学家及其著作，素有专深的研究，他们欣然接受我的邀请，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共同努力，使得“北大哲学门经典系列”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编辑完成了。对他们的大力协助和有效工作，我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系列的编选尽量以突出其哲学思想为主，名著和名篇并重。编选力图与已有选集有所不同，体现出编者独到的选读眼光和安排构思，从而使得本系列在突显这些学者对20世纪中国哲学创作与研究贡献的同时，亦以提供本系列编者的独到解读为特色。

本系列的编辑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十五”“211”工程计划的支持，也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陈 来

2004年12月20日

前 言

编辑《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胡适选集》，我以为这等于发问：胡适对中国现代哲学做出了什么贡献？胡适的哲学成就对北大的哲学学科建设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尝试回答这两个问题，是这篇前言的要旨所在。

1923年12月蔡元培先生应《申报》社之约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内中提到：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①其中特别提及胡适的即为：一是从介绍西洋哲学这方面看，“胡氏可算是介绍杜威学说上最有力的人”；二是从整理古代哲学而言，“绩溪胡适把他在北京大学所讲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刊布出来，算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②蔡先生发表这段话时，胡适不过三十二岁，尽管他的生命后来还延续了三十九年，他的哲学研究工作仍在继续，但他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他对北大哲学学科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并未脱离蔡先生所提示的轨迹。因此，我们今天来总结胡适的哲学成就时，大体也只能从介绍西洋哲学和研究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这两方面来讨论。

在胡适之前，中国学人介绍西洋哲学有严复、李石岑、王国维诸人，但他们主要介绍的是欧洲哲学。具体的说，严复译英国哲学家赫胥黎、斯宾塞、约翰·穆勒等人的作品；李石岑介绍法国哲学家卢梭、伏尔泰、拉马尔克等人的学说；王国维评述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尼采的思想。介绍美国这块“新大陆”的哲学则自胡适始，他对美国本土哲

①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蔡元培卷》，第32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

②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蔡元培卷》，第359页。

学的系统介绍始于1919年4月15日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实验主义》一文，这篇论文从辨析“实验主义”名称的“引论”开始，到逐一介绍皮耳士、詹姆士、杜威的学说，尤其是对杜威哲学的推介给予了较大的篇幅，反映了胡适对杜威的“应用主义”（或“器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偏爱。胡适之所以将这派哲学的中文译名定为“实验主义”，是因为他认为：“‘实际主义’（Pragmatism）注重实际的效果；‘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虽然也注重实际的效果，但他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这一派哲学的始祖皮耳士常说他的新哲学不是别的，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The Laboratory attitude of mind）。这种态度是这种哲学的各派所公认的，所以我们可用来做一个‘类名’。”^①对自己的这篇文章，胡适颇为自信，1921年7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当初本想不把《实验主义》全部入入，现在仔细看来，这几篇确有存在的价值。恐怕现在英文的论‘实验主义’的书，如Murray的Pragmatism之类——没有一部能比我这一本小册子的简要而精彩。”^②遗憾的是，后来许多国人囿于偏见，有意无意地扭曲胡适的本意，常常使用“实用主义”这一在中文中明显带有贬意的名称。《实验主义》发表于杜威来华讲学前夕，它对实验主义的系统评介等于是为杜威来华讲学做了一个巨大的广告。

杜威在华讲学长达两年（1919年4月30日—1921年7月），为“实验主义”在华夏大地布道，同时也将近代以来的中美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杜威的巡回讲学中，胡适与杜威的其他嫡传弟子蒋梦麟、陶行知、刘伯明等随侍左右，为其讲演担任翻译。胡适出力尤大，杜威在北京、天津、山西、山东等处的讲演几乎全为胡适担任口译，经胡适翻译而整理出来的《杜威五大讲演》（1920年8月《晨报》出版）影响极大，短短一年间，即已印行11版，每版都在一万册以上，实验主义蔚然成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西方哲学理论，对推动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以后，胡适又在北大开设“杜威著作选读”（1921年10月），与唐钺合译杜威的哲学著作《哲学

① 《实验主义》，《胡适文存》卷二，收入《胡适文集》第2册，第208—20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② 《胡适的日记》，第125页，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9月初版。

的改造》(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毫不掩饰地多次公开宣布自己是“实验主义的信徒”,他的政治主张和学术方法都是为了践行实验主义。抗战期间胡适撰写了讨论杜威政治哲学的两篇英文论文:《工具主义的政治哲学》(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和《作为一种工具主义的政治概念》(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胡适晚年以“杜威哲学”(1952年12月)、“杜威在中国”(1959年7月)为题发表演讲。可以说,胡适终其一生从理论传播到学术研究,都身体力行地推行实验主义,成为实验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第一传人。

胡适介绍西方哲学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在北大首先开设西方哲学史课程。1917年9月胡适来北大任教之初,即开设“西洋哲学史大纲”一课,另在哲学门研究所承担“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一课,指导学生冯友兰、张崧年、唐伟。^①据冯友兰先生回忆:1915年9月他进入北大,“但是并没有达到我原来要学习西方哲学的目的。当时的北京大学,照章程上说,有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实际上是印度哲学门压根就没人提。西洋哲学门,本来说是要在1915年开的,可是只找到了一位教授,名叫周慕西,不久他就去世,所以也开不成了。已经开的只有中国哲学门,这个学门已经有了比我高的一班,我们班算是这个学门的第二班。”^②由此不难看出当时北大哲学门西洋哲学史这一科目教学状况的窘境。胡适登上北大讲台,实为填补这一空白。可惜这方面他留下的材料只有一部《西洋哲学史大纲》讲义稿残稿,内容仅有“导言”和“希腊哲学”部分。^③

胡适还写过一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1922年《申报》为纪念该报五十周年编辑、出版一册《最近五十年》,邀约各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撰稿。其中涉及哲学部分的《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由蔡元培先生承担,而胡适被分配撰写《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可见胡适当时被人们看成是这方面的最佳人选。胡适之前,虽有不少学者介绍西洋哲学,但他们却大多没有欧美系统接受西方哲学教育和训练的经历,

① 《哲学门研究所》,载1917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2号。

②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收入《三松堂全集》第1册,第18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

③ 手稿本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9册,第219—281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整理本收入《胡适全集》第7册,第272—32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

更说不上像胡适这样经历了从学士到博士一个完整的学术训练过程，因此他们对西方哲学的介绍只可能是个别的、或随感性的，而“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这样一个题目对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显然是一个前沿课题，它需要在欧美国家有过系统哲学训练背景，且对欧美哲学的最新发展动态有详尽了解的学者才可能承担。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一文中，胡适着重介绍了新意象主义、尼采的哲学、演化论的哲学、实验主义、柏格森的哲学、新唯实主义、政治哲学（此节由高一涵代作）。这几方面的内容大都虽已有学者在某一方面做过专题介绍，但胡适独立承担，并在一篇只有三万三千多字的文章里，对如此纷繁的哲学流派做一有力的介绍，绝非一般行家能够做到。窥察这两件事例，在“五四”时期中国的西方哲学史教学和研究中，不难看出胡适发挥了筚路蓝缕的作用。

二

胡适将“新思潮的意义”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①对他个人来说，“整理国故”则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两大目标”，后来他又“喜欢把‘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胡适晚年自认：“这两方面也是我留学归国以后，整个四十年成熟的生命里‘学术研究’的主要兴趣之所在。”^②

胡适一生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19年以前，主要研治中国古代哲学史，其代表作为其英文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和在北大的讲义稿《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胡适萌发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念头是1905—1906年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期，当时他阅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

①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收入《胡适文集》第2册，第5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② 《胡适口述自传》第十二章《现代学术与个人收获》，收入《胡适文集》第1册，第415页。

之大势》这部著作，梁启超在书中“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即：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四、老学时代（魏晋），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但梁氏未写完此书，胡适“眼巴巴的望了几年”，在失望之余，他忽发野心：“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这一点野心就是他“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①

1912年春，胡适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由农学院转入文学院，其主修即为哲学和心理学。1915年秋，胡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文学院，主修仍为哲学，受导师杜威先生“论理学之宗派”一课的影响，胡适决定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定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时中文名改为《先秦名学史》），此论文的撰稿大约在1916年5月即已启动，至1917年4月27日完稿。^②1922年在国内由亚东图书馆正式出版时改名为《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出版时胡适可能小有修改）。写作这篇论文，胡适抱着一个雄心：“但愿它成为用中文以外的任何语言向西方介绍古代中国各伟大学派的第一本书！”这一点似与此前在哥大留学的陈焕章写作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有异曲同工之处。陈书是中国留美学生第一本以西方经济理论分析孔儒经济思想的博士论文，而胡书则是第一本以西方哲学方法研讨中国古代哲学的博士论文，在这一点上胡适可能是受到陈书的影响，至少曾为陈书作序的夏德教授（Friedrich Hirth）亦为胡适的“汉学”一课的教师，胡适与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③事实上，胡书在论证主题上与陈书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胡书写作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与陈焕章所

① 胡适：《四十自述·在上海（一）》，《胡适文集》第1册，第73页。

② 关于胡适写作博士论文的时间，他本人提供了两个开始写作的时间，一是1916年5月10日《致母亲》一信提到“儿之博士论文，略有端绪”。二是他在1917年5月27日日记中记道：“原稿始于去年八月之初”。此两说，笔者从前一说。

③ 《胡适口述自传》第五章《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收入《胡适文集》第1册，第260—261页。

推动的孔教运动进行论辩，这一点胡适在导论中毫不掩饰地承认。^① 陈氏是抱着阐述孔教学理的目的来写作他的博士论文，而胡适则是抱着参与反对孔教运动的动机来写作自己的博士论文，他把阐述非儒学派的思想学说和恢复儒家学派的原初地位作为自己写作的两大目标。但胡适与陈焕章两人的博士论文在哥大的命运却大相径庭。陈书受到哥大两位权威学者：夏德（Friedrich Hirth，汉学教授）、西格（Henny R. Seager，经济学教授）的大力推荐，荣幸地跻身于由哥大政治学教师编辑的“历史、经济与公共法丛书”；而胡适的博士论文却在博士论文答辩中未能顺利通过，当年他没能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其中的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让人们迷惑的悬案。但夏德教授给陈书作序表现出的好感所产生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很可能是阻碍胡适论文通过的重要原因。胡适博士答辩的受挫，反映了欧美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主流看法很大程度上仍受传教士（他们往往在西方被视为中国通）观点的支配，正是这些传教士对清末民初的孔教运动抱以热烈的支持，^② 而对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却视而不见。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胡适在北大的讲义稿，此课先前由颇具旧学根柢的老先生陈汉章讲授，胡适接任此课，对他无疑是一个强烈的挑战。但与在哥大的命运不同，胡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讲义稿1919年2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就重印再版，在知识界产生了轰动性的效应，众多名家对之评点。这部书的成功得益于胡适具有系统的西方哲学训练和中国汉学训练的学术背景，这一点为蔡元培先生在序中所点明。而胡适此书成功背后还有一个常被人忽略的政治背景，即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当时正在寻找各种攻击康有为、陈焕章领导孔教运动的有力武器，胡适此书无论在学术方法上，还是在学术观点上，都与康、陈相对立，而与当时北大的主流派章太炎派（即汉学派）相一致。正如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在保守的留美学生中应者寥寥，而在国内因得到陈独秀的鼎力推荐，激起巨大反响一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因有蔡元培先生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保护

① 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逻辑与哲学》，收入《胡适文集》第6册，第11页。

② 参见陈焕章：《孔教论》，香港：孔教学院，1990年12月九版。此书前有美国李佳白、英国梅殿华、英国李提摩太、德国费希礼的序，这些人显然代表西方传教士和所谓“中国通”的主流观点。

神”作序予以大力推荐，也迅速成为新学术的典范。^①

第二阶段从1919年至1937年，主要代表作为《戴东原的哲学》（1925年）、《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中国中古思想小史》（1931年）等。

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后，胡适有意续写下去，他在北大开设了“中国中古思想史”、“近世中国哲学”、“清代思想史”等课，留有手稿：《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近世哲学》、《清代思想史》^②；发表了《记李觥的学说》（1922年）、《费经虞与费密》（1924年）；出版了专著《戴东原的哲学》（1925年）。1922年2月23日哥伦比亚大学聘请胡适赴该校任教的邀请函到达胡适的手里，胡适“颇费踌躇”，最后考虑到要续写完《哲学史》中下卷，还是“拟辞不去”。^③

1927年5月胡适从欧美访问归来，落居上海。在上海的三年半，是胡适“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他写作了“约莫有一百万字的稿子”，其中有《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有十几万字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包括《神会和尚遗集》和《荷泽大师神会传》）。1930年11月胡适回到北平，继续做中国思想史的专题研究，又发表了《说儒》（1934年）、《楞伽宗考》（1935年）、《颜李学派的程廷祚》（1936年）等专题论文。与此同时，他还在北大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1931年9月—1932年6月、1932年9月—1933年6月、1936年9月—1937年6月）、“中古思想史”（1932年2月—6月）、“中国近世思想史问题研究”（1934年9月—1935年6月、1936年9月—1937年6月）、“汉代思想史”、“唐宋思想史”（1936年9月—1937年6月）等课。看得出来，胡适有意写作一部新的《中国思想史》。

胡适在上海动手写《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时，就“决定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名称了”，他把《中国哲学史大纲》改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版，以便让其单独流行，而打算用自己“中年以后的见解来重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

① 关于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一书各家观点的述评，参见拙作《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阐释》，第126—143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版。

②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6册。《中国哲学小史》、《近世哲学》、《清代思想史》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7册。

③ 《胡适全集》第29册，第523页。

史》”。^①为什么不续写“中国古代哲学史”，而要重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对于这个问题，胡适本人并没有细加说明。从他后来成稿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中古思想小史》可以看出，他很难再采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写法来处理中古时期（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000年）的哲学史，这是因为这一段“宗教化的普遍”影响到“思想的宗教化”，^②故要写一部纯粹的“哲学史”著作已不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与胡适对中西哲学的关系的看法有关，在写作《先秦名学史》时，胡适已表示：“如果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③这样一种“中西互释”的设想只能说是一种理想。在实际处理中，往往是把西方哲学作为一种普遍范式运用于中国哲学领域，^④这样中国哲学就不可避免地“西化”、“洋化”、“欧化”、“美（国）化”、“汉（学）化”。金岳霖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⑤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世界文化区分为三：西方、中国、印度，并对这三大系统的文化作了区隔。他的观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胡适对之持激烈地反对态度。^⑥但梁氏的观点唤起了人们对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特殊性的重视，也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对于中西哲学相互关系的重新思考，此后出现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新的趋势。^⑦当胡适的研究工作由上古移至中古，他所面对的是一个

①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收入《胡适文集》第6册，第158页。

② 参见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小史》第一讲《中古时代》，收入《胡适文集》第6册，第629页。

③ 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逻辑与哲学》，《胡适文集》第6册，第11页。

④ 有关这方面的意见，参见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收入《胡适文集》第6册，第155页。冯友兰：《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收入《三松堂全集》第11卷，第403页。

⑤ 金岳霖：《审查报告二》，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卷，第379—380页。

⑥ 《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收入《胡适文集》第182—199页。

⑦ 有关冯友兰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评论，参见其英文论文 shu-ming: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ir Philosophies, 此文刊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杂志》第19卷第22期。冯氏对梁书的反应与胡适有很大不同。参见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稿》，第58页，收有此文的中译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更为庞杂的思想系统，他显然感到以一种比较固定的西方哲学形式来处理这样一个庞杂的中国思想系统已不可能，故不如采取一种比较灵活、宽泛的办法来处理，这样给自己的写作以更大的空间，以便能反映丰富的中国思想史内容，这也许是他改写一部《中国思想史》的动机。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色彩越来越浓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一方面与中国哲学史自身的内容相关，即中国哲学本身相对于西方哲学来说，更注重对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思考，在写作方式上也表现出更为随意、灵活的样式；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使然，近代中国的大思想家的思想和著述活动，往往构成时代思潮的中心，“要想在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之外另找一个纯哲学的中心问题，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①胡适的特殊地位多少也受到这一限制。由于当时中国濒临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胡适的“中古思想史”写作也加大了政治思想史的篇幅，他特意将其中的第五章——《淮南王书》出版单行本，且在面见蒋介石时，将此书赠给蒋氏，以委婉地表达自己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和不满，即是一例。

第三阶段从1937年到1962年去世，这时期胡适除了1946年7月至1949年4月在大陆，1958年至1962年2月在台北外，其他时间几乎全在欧美（主要是在美国）。由于工作、生活环境的变更，受众对象的改变，胡适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他这一阶段很少用中文撰写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方面的论著，留下的主要是一些英文论文或讲演稿，如《中国思想史纲要》（*Chinese Thought*, 1942、1946年）、《中国人思想中的不朽观念》（*The Concept of Immortality in Chinese Thought*, 1945年）、《中国传统中的自然法则》（*The Natural Law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1951年）、《佛教禅宗在中国：它的历史与方法》（*Ch'an (Zen) Buddhism in China: Its History and Method*, 1952年）、《古代亚洲世界的权威与自由》（*Authority and Freedom in the Ancient Asian World*, 1954年）、《古代中国思想中怀疑的权力》（*The Right to Doubt i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1954年）、《杜威在中国》（*John Dewey in China*, 1959年）、《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 in Chinese Philosophy*, 1959年）、《呼吁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

系统地调查多年散失在日本的唐代早期禅宗资料》(An Appeal for a Systematic in Japan for Long - Hidden T'ang Dynasty Source - Materials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Zen Buddhism, 1960 年)、《中国传统与将来》(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 1960 年)、《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Social Changes and Science, 1961 年)等。这些英文文章或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哲学思想,或与美国学术界展开对话、辩论。在当时中国哲学界,像胡适这样在美国大量发表自己的英文作品,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可以说极其罕见。与自己在国内发表的中文作品不同,胡适的英文作品较多地是向外国人正面介绍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或者反驳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偏见,这表现了胡适的中国情怀的另一面。

胡适一生只留下《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两部英文著作,他原还有写作英文本的《中国哲学史》的打算。胡适最早设想写作英文本《中国哲学史》的想法是在1920年9月,当时他考虑接受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该校任教,以便“作英译哲学史”,^①后来哥大聘书果然来了,但胡适又改变这一主意。^②1927年1月胡适来到美国,应邀在哥大中文系作过六次以“中国哲学中的六个时期”为题的英文演讲,获得了哥大师生的热烈反响,胡适遂计划利用这些讲稿,“预备将来修正作一本英文书”,并称“我的《哲学史》上册,先作英文的《名学史》。今又先作英文的全部《哲学小史》,作我的《新哲学史》的稿子,也是有趣的偶合。”^③遗憾的是,胡适为准备这些演讲所写的讲稿,今天仍不知存在何处。迄今出版的《胡适英文文存》和《胡适全集》都未见收入这些讲稿。这个想法一直延续到胡适的晚年,1944年11月至1945年5月胡适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结束时,胡适亦曾打算将讲稿整理成书,他在1945年5月21日给王重民的信中说:“此间教课,每讲都有草稿,用‘拍纸’写。夏间想整理成一部英文《中国思想史》。”^④1950年代初,胡适读到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冯友兰著英文本《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① 参见胡适1920年9月4日日记,《胡适全集》第29册,第20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

② 《胡适全集》第29册,第523页。

③ 《胡适全集》第30册,第481页。

④ 《致王重民》,《胡适全集》第25册,第135页。